



颜晓峰◎著

认识自己
构成自己的道路



NLIC 2970695485

认识自己

构成自己的道路

颜晓峰◎著



NLIC 2970695485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认识自己构成自己的道路 / 颜晓峰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3

ISBN 978-7-5004-9548-2

I. ①认… II. ①颜… III. ①认识论 - 文集 IV. ①B01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24569 号

策划编辑 冯春凤

责任编辑 鉴传今

责任校对 修广平

封面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技术编辑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1 插 页 2

字 数 346 千字

定 价 4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这本书收集了我在 1987—2009 年写作和发表的一部分认识论与哲学的论文，共收入 35 篇，按照内容的逻辑关系排列成章。

1987 年之前，我曾在北京军区某部炮兵团工作了 12 年，从战士、副班长、班长、排长到政治处干事；又在石家庄陆军学院哲学教研室当了 6 年教员，其间在政治学院哲学教员培训班上了 2 年学。

1987 年 9 月，我考入国防大学研究生院攻读硕士研究生，师从谭恩晋、蔡祖鹏教授，专业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向为认识论。

硕士生毕业以后的 7 年间，我先在后勤学院政治教研室从事哲学方法论的教学，后在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室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

1997 年 9 月，我又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攻读博士研究生，师从夏甄陶教授，专业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向仍为认识论。

2000 年 7 月毕业后，我回到了国防大学政治理论教研室（现为马克思主义教研部）。

任哲学教师三十年来，我的哲学工作领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教学与研究，从 1987 年起，我的专业方向定在了认识论。认识论是对认识的认识，我以认识论为对象的研究，本身又是一个认识过程。20 多年来我的认识论研究轨迹，是由导师、学业、职业、任务、社会、个人等多种因素综合规定而形成的。黑格尔曾指出，精神的运动就是概念的内在发展，自己构成自己的道路。列宁把“自己构成自己的道路”解释为“真正认识的、不断认识的、从不知到知的运动的道路”。夏甄陶教授则根据黑格尔和列宁的思想，概括出“认识自己构成自己的道路”的命题。意思是说，认识作为观念的、思维的活动，有自己的发展动力，能开辟自己的发展方向，孕育出自己的成果，并能反思自己的发展规律。借用黑格尔

的思想做书名，只是想说明，我的认识论及其哲学研究，虽然是微不足道的，但也构成了自己个性化的道路，可以作为我国 20 多年来认识论研究的一滴水，作为分析我国认识论个人研究状况的一个案例。这也是我出版本论文集的目的之一。

“军事、博弈与认识”已单独结集由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为《知与胜：基于军事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视角》。

在此谨对那些帮助我走上哲学和认识论之路的师长、领导和朋友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本书存在的问题、缺点和不足，恳请各位师长、专家和同仁批评指正。

作者
于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2011 年 2 月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认识、哲学与历史	(1)
一 自然经济与认识活动	(1)
二 中国哲学史上的言意之辨	(10)
三 世界的二重化与哲学的演化	(20)
四 全球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实践基础	(33)
五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课题	(46)
六 发展和发展观	(52)
七 发展观历史研究的意义与方法	(60)
八 深入理解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	(74)
第二章 理论、方法与规律	(80)
一 理论的机制和韧性	(80)
二 论方法的系统性	(88)
三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方法论转变	(95)
四 改革的方法论原则	(105)
五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待现代西方哲学的方法论	(111)
六 预见的可能空间	(124)
七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	(134)
第三章 实践、创新与知识	(141)
一 论人的内在尺度	(141)
二 论实践创新	(150)
三 创新简论	(163)
四 知识是人的积极的、创造性的活动	(179)
五 知识创新的实践诠释	(182)

六 论继续解放思想	(189)
第四章 市场、价值与认识	(197)
一 商品之谜的揭示及其社会认识论意义	(197)
二 认识社会化的市场机制	(206)
三 市场机制的认识论研究	(220)
四 人的价值在于创造价值	(231)
五 信用与文明	(237)
六 诚信规范的认识原因	(242)
第五章 思维、文化与科技	(248)
一 科学技术与思维方式的历史演进	(248)
二 20世纪的科学技术发展与思维方式变革	(261)
三 科技革命与创新思维	(274)
四 论哲学思维方式	(283)
五 科技与文化的历史演进	(292)
六 论大众文化	(304)
七 全球文化的融合与冲突	(313)
八 信息社会与认识活动	(322)

第一章 认识、哲学与历史

一 自然经济与认识活动^{*}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认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即认识活动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包括他们的认识活动，要受到“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人的幻象、想象和思维，也是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①自然经济是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最初形态，也是经历了最漫长时期的形态，是近现代资源配置基本方式之一——市场经济的史前方式，人的认识活动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发生、发展的。考察这一形态条件下的认识活动，揭示其性质、特征与规律，可以作为市场经济中认识活动的发生学研究，并且不仅从劳动的自然方式，而且从劳动的社会方式，特别是交往与交换方式，探讨认识的发生与发展机制。

（一）人的认识活动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

自然经济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要产业，土地是劳动的主要对象，农民从事着小规模的粗陋的土地耕作，进行着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家庭、氏族、部落、村社、庄园、马尔克是社会组织的原子。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必然造成了生产和社会的狭隘

* 原载《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73页。

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生产者终年束缚在不能移动的土地上和不能脱离的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内，束缚在所有权分配使他所处的社会等级内。对于人们的活动空间来说，“部落始终是人们的界限，无论对别一部落的人来说或者对他们自己来说都是如此”。^① 在这种自然形成的封闭状态下，人的认识活动只能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总受着地域性的局限。

自然的共同体限制了人的活动天地，也就同时限制了人的视野，使人的眼界极为短浅。人们画地为牢，“小国寡人”，“重死而不远徙”（老子）。在古希腊的荷马时代和希西俄德时代，“人们是安土重迁的；非有重大的、反常的事故，人们从不出去旅行。每个人的生活都束缚在一个非常狭窄的天地里。航行仍然是使人不敢冒险并且是不常有的事。”^② 随着希腊人在地中海的扩张，走出城邦，与世界贸易、文化往来的增加，古希腊的科学与文化才达到了鼎盛时期。我国唐代商品经济在城镇已有一定发展，但广大农村更多的仍然是“家家守村业，头白不出门”，“生者不远别，嫁娶先近邻”（白居易）。这就容易形成人的思维世界的狭隘性。于是就产生了“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不行而知”（老子）的超感官的直觉主义认识论。足不出户而知天下依靠的不是发达的信息网络，而是个人的神秘体验，这就在认识的局限性之上又加上了盲目性。

语言是劳动的产物，是社会交往的产物，自然经济的共同体孤立、封闭的存在状态，使语言的差别、难以交流成为交往的地域障碍之后的又一障碍。中世纪欧洲几乎每个省份都有自己的方言。而在美洲土著中间持续了几千年的部落分化过程，使得仅仅在北美就形成了四十种语系，每一种语系又分为若干种方言，其数目与独立的部落数目相等，部落与方言范围一致。^③ 语言是思维反映和掌握世界的中介性工具，语言的分散与复杂，极不利于不同语言的群体之间交流认识成果。这种状况一方面巩固了共同体的分离和孤立，一方面又限制了运用语言进行认识活动的能力发展。直到文字的出现与通用才使这种状况得以改进。

狭隘的活动范围限制了主体的认识能力发展，而主体认识能力的限制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6页。

^② 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2页。

^③ 参见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109页。

又进一步强化了认识活动的局限性。封闭的经济与文化缺少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很难引进新的事物和思想，造成了共同体内部的变化缓慢，难以更新。人们活动的依据更多的是经验、传统和惯例。法国历史学家布洛赫（Marc Bloch）写道：“古代农业社会是建立在道地的传统主义上的，在这种社会中，只有那些长期延续的事物才最有存在的理由。集体的传统——习惯法——统治着人们的生活。”“（小农）他们把自己关闭在土地中，拒绝改变土地的结构，很少对突如其来的革新感兴趣……他们很难摆脱祖传的习惯方式，他们接受进步的新技术十分缓慢。”^① 传统成为渗透于认识的主客体关系中的重要因素，制约着主客体的相互塑造与改造。

自然经济决定了人对自然的狭隘关系和人自身之间的狭隘关系，这种局限性产生了人对自然的畏惧以及对自身能力的不信任，产生了古代的图腾崇拜、自然崇拜。人们对周围环境、自然界的意识是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马克思和恩格斯），人们像动物一样慑服于自然界，相信一成不变的自然命运。即使意识到人必须和周围的人往来，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中的，这种社会也只是共同体化的社会，这种意识也只是一种“畜群意识”或“部落意识”，还不是真正的社会的意识。

生产方式的历史形式不仅决定了社会形态的历史形式，也极大地影响了人的思维方式的历史面貌。马克思曾深刻地剖析了印度村社制度对人的精神状态、思维方式所起的建构作用，他说：“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些不开化的人的利己主义，他们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上，静静地看着一个个帝国的崩溃、各种难以形容的残暴行为和大城市居民的被屠杀，就像观看自然现象那样无动于衷；至于他们自己，只要哪个侵略者肯于垂顾他们一下，他们就成为这个侵略者的驯顺的猎获物。”^② 前殖民时代的印度如此，18世纪前英国的农村也是如此，恩格斯写道：“农民当时十分虔诚地、安分守己地过着平静和安宁的生活，生活中没有许多操心的事，但也没有什么变动，没有普遍利益，没有文化教

^① 马克·布洛赫：《法国农村史》，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85、26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5页。

育，没有精神劳动”，“像远古时代人似的对任何共同的利益和精神需求漠然处之，处在还没有社会、还没有生活、没有意识、没有活动的社会幼年时期。这种状况事实上是封建主义以及中世纪缺乏思想性的状况的继续”。^① 也就是说，自然经济所造成的人的活动的狭隘性和孤立性决定了人的认识还处于社会性发展幼年时期。

（二）人的活动和能力表现出“原始的丰富”

自然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经济，贸易与市场的不发展、不可靠与自给自足经济的发展互为因果。交换起初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在不同共同体的边界上发生着，只是附带、偶然进行的，在整个经济中不起支配作用。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是与孤立封闭的生活方式相辅相成的。缺少交换自然导致缺少交往，《老子》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正是这种闭塞的、田园诗般的社会的生动写照。没有商品货币关系，维系人的关系的纽带只能是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从属关系。

自然经济是人的发展的早期阶段，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迫使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表现出“原始的丰富”（马克思）。独立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有着自己的知识、意志和判断力，能够使用自己的工具，独立完成产品生产的全过程，依靠经验的积累，成为个体劳动者。“这种小生产是社会生产的技艺养成所，是培养劳动者的手艺、发明技巧和自由个性的学校。”^② 在生产力不发达条件下个人的比较全面和丰富，正是因为小生产还没有形成自己丰富的关系，即全面的交换关系所造成的。缺乏交换关系，就不能利用和共享社会的劳动和知识产品，不能把不同的个人能力组成社会的共同能力和资源。动物不能利用其他动物的天赋和能力，而人能够通过市场的交换关系互相利用，各得其所。因此，在自然经济内部也逐渐发展出了分工与交换、货币与市场。

自给自足就意味着生产者对自己的生产过程和产品的支配，他们是供给与需求、生产与消费的一体化，在耕耘和收获、采料与加工之间都是直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2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4页。

观地把握的，这些环节没有、也不需要社会的中介——交换价值。在这种生产活动中的认识活动表现出直观性、简单性的特征。生产什么根据自己生活的需要，而不是经常变化的市场需要；生产多少以自我需要为限，更多的是以有限的生产能力为限，而不需要担心产品过剩、供大于求的市场危机；生产材料个人拥有或自己生产制造，没有精确的成本核算和细致的会计簿记；生产时间受自然条件而不受价值概念约束，因为劳动生产率低以及缺少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的参照尺度；生产过程更多的是担心气候、战乱等因素，而没有考虑难以预测的市场变化因素的必要。同时，由于生产者参与了生产的全过程，统一了生产与消费，他的认识活动也具有原始的丰富性与全面性。

小生产的自给自足性表现为“万事不求人”的准则，追求自我能力的独立性。在小生产那里，范围有限的知识和经验是同劳动本身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手和脑还没有相互分离”（马克思）。德国经济史学家桑巴特（Werner Sombart）指出，前资本主义的手工业者将工程师的一切聪明，化学实验室一切研究的结果联合在自己的身上；此外他兼做生产的组织者和指导者，总指挥、工头和助手都联合在一人的身上；同时他也是商人，一切购入和卖出的活动与一切投机的事项，都为他一人能力所包办。^①人的精力、能力是有限的，这种既要具有理论知识又要具有动手能力，既要熟悉生产过程又要掌握销售活动的全面性要求，恰恰成为人的认识能力发展的束缚与限制。这就导致了个体手工业生产方法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缺乏创新，手工业技艺缓慢地进步着，其产品保持着很浓的个人色彩。

自然经济中生产的知识、经验和技艺，由于没有知识产权制度，只能是自我摸索积累和自我保护封锁，生产者对特殊技艺严加保密，制定严格的传授家规或行规，这就延缓了新技术、发明向社会的扩散与社会受益，阻碍了个体认识向社会认识的转化。手工业各种特殊的技艺直到18世纪还称为 *mysteries*（秘诀），“这层帷幕在人们面前掩盖起他们自己的社会生产过程，使各种自然形成的分门别类的生产部门彼此成为哑谜，甚至对每个部门的内行都成为哑谜。”^② 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专利”行为，实际上也不利于所有者自身的发展和获利。缺乏有效的知识交换的市场关

^① 参见伟·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第1卷，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11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3页。

系，已经创造出来的科学技术就不容易保存。生产者之间如此，民族之间也是如此。古代腓尼基人的大部分发明都失传了，主要原因就是这个民族被排挤于商业之外，这些发明未能通过交流、交换而流传。生产技艺的保守性制度，不容易吸收他人的技术成果，还导致了生产认识活动的自满自足，故步自封，保持在低水平重复的状态。

造就了人的“原始的丰富”的自给自足经济，也是客观环境造成的，即社会分解为许多固定不变、互不联系的原子的现象，缺乏交往的纽带。原始共同体内部的纽带是共同的血缘、历史和语言，这是一个小世界。而缺乏与外界交往的需求，就难以建立和发展与外界交往的纽带。自给自足的经济使道路稀少，道路不仅是物质的通道，也是信息的通道，道路的缺少、信息的闭塞又使自然经济的孤立状态长久存在下去，成为自然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的重大要素。在这种条件下活动的人，只能依存于共同体内，以自己的比较全面和丰富来弥补共同体的比较贫乏与单调。

（三）科学认识活动更多地属于“私人艺术”

分工是与生产力和劳动方式的发展相一致的，也是认识活动专门化的基础。自然经济中的分工经过了家庭、氏族内部以性别和年龄为基础的自然分工，社会内部以生产资料的形态为基础的社会大分工，生产部门内部以产品为基础的劳动分工。但是，“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① 精神劳动从物质劳动分离出来，脑力劳动者阶层的形成，是认识的社会发展的重要环节。这样，认识就可以通过专业化、职业化的方式从日常认识层面提升为科学认识、理论认识层面，以少数人脱离物质劳动为条件“发展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马克思），真正在社会的性质和水平上成其为认识。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工，促成了城市与乡村的分化。城市吸引和集中了人口、财富和人才，它不仅是商品流通的集散地，也是思想文化、科学知识甚至生活时尚流通的集散地。城市的产生也促成了“劳心者”、知识分子阶层的形成。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2页。

“在西方国家，中世纪的知识分子随着城市而诞生。”^① 通过人员、资料和信息在空间上的集合，发展科学知识。

由于自然经济社会的交换和商品货币关系不发达的限制，分工也是不发达、不充分的，还没有摆脱自给自足经济的窠臼。这不仅表现在物质生产方面，也表现在精神生产方面，科学认识活动更多地还属于“私人艺术”（黑格尔）行为。

在古代，一个人既可以是杰出的哲学家，同时又是杰出的诗人、演说家、历史学家、执政者和军事家，在学术领域和社会领域全面表现施展其才能。在科学领域，许多学者都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如亚里士多德、达·芬奇，“在好几个专业上放射出光芒”（恩格斯）。这与当时人类知识总的状况有关，也说明了科学还处于缺乏严密分工和社会交流的私人艺术阶段。古代科学还没有分化，对象世界以及科学本身的分界还不明显，个人的学术活动并不存在学科的限制；各门科学的“范式”（库恩）还没有形成，人们并不需要以成为科学共同体的一员和接受“范式”的训练为条件，从事科学活动。因此，古代科学家们面对着有限存量的人类知识，处于富于创造性的主动地位，而没有当代人面对“知识爆炸”时的茫然。

自然经济社会的分工还是保持个体劳动方式的分工，科学活动也只是脑体分离意义上的分工，还不是科学工作内部的分工与协作。私人艺术的性质也表现为科学的个体劳动的方式。中世纪的一个教士所需要的工具是：“一张斜面桌，一盏带油的夜灯和一个蜡烛台，一个提灯和一个漏斗型墨水瓶，带有一只羽毛笔、一条铅丝和一把直尺，一张桌子和一条教鞭，一个讲课用凳，一块黑板，一块带有括刀和粉笔的浮石。”^② 这完全是手工作坊的摹本。缺少公共信息机构，资料难寻，中世纪有的学者为找一部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作品，用了 20 多年也没有找到。个体劳动式的科学活动，自然影响了科学生产的效率和科学发展的速度。

成为脑力劳动者除了智力因素和接受教育外，还要有生活保障和收入来源。古代以科学为业的知识分子，有的是进入朝廷、宫廷，通过为其服务而由其供养，有的是依靠不同渠道的赞助，有的是以传授知识为业换取报酬，而有一部分则完全是出于个人对科学事业的热爱，运用个人的财产

^① 雅克·勒戈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第 4 页。

^② 同上书，第 76 页。

从事科学活动，成为为科学而科学的消费，而不是为利润而科学的生产。13世纪英国哲学家、科学家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用了数十年的时间投入了大量的资财用于新学科包括实验科学的发展。他回顾说：“我用了二十年来掌握知识，放弃了普通人的生活方式，二十年里，我在这些事上花了2000多英镑，还不算书籍、实验、仪器、图表、学习语言等等的费用。”最后，培根从富有的人到不名一文，他也失望了，听从了友人的劝告，当了修士。培根一生的成就《大著作》、《小著作》和《第三部著作》所得到的唯一奖励就是教会首领们判处他的监禁。^①由此可见，只有到了市场经济社会，科学成为生产力的独立要素，“科学本身也成为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马克思），科学才能成为社会的事业。

科学的生产从私人的艺术转化为社会的活动，个人的智力资源转化为社会的智力资源，知识形态迅速转化为物质形态，需要相应的社会关系、社会动力促成。而在自然经济的时代则缺乏这种社会关系和机制。工业革命之前，人类技术变革的速度缓慢。1624年，英国制定了第一部专利法，这对于促进那些带动工业革命的知识创新、技术进步起了重要作用。在18世纪，数学、力学、化学领域的发现和进步，无论在法国、瑞典、德国，几乎都达到和英国同样的程度，发明也是如此，例如在法国就和在英国差不多。然而，在当时它们的资本主义应用却只发生在英国，“因为只有在那里，经济关系才发展到使资本有可能利用科学进步的程度”。^②

（四）交换手段的不发达限制了交往的扩大和技术的改进

分工与交换互为条件，历史上的自然经济内也发展着交换经济，包括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我国先秦就有“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③的记载，宋代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起初的交换是物物交换，物物交换就是货币演化史的开端，交换的场所与方式就是市场的起源。交换带来了社会交往和精神交往，市

^① 参见《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第4册，红旗出版社1992年版，第252—253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98页。

^③ 《易传·系辞下》。

场塑造着交换与交往的共同语言。但自然经济条件下交换内容的贫乏、交换手段的落后、市场的狭小又制约着人们交往的广度和深度。

市场交换手段的发展过程，就是人们的认识从个别达到一般，从具体上升为抽象的过程，就是寻找等价物的最合适的表现形式的过程。物物交换就是从具体物开始，这种交换方式的困难在于使用价值的多样性、特殊性，不易分割和难以量化，而且等价物的地域性限制了交换的普遍性。物物交换的基础是对产品劳动量的估算。中世纪的农民能够相当准确地知道，要制造他换来的物品，需要多少劳动时间，能够按照原料、辅助材料、劳动时间而相当精确地互相计算出日常用品的生产费用，因为“村里的铁匠和车匠就在他眼前干活；裁缝和鞋匠也是这样”。但是，商品的劳动所需时间越长，进入交易的商品种类越是繁多，越是来自遥远的地方，生产这些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就越是难以核对、计算。^①这就显出了物物交换、以劳动量为尺度交换的局限性，提出了发展更为一般的交换中介手段、一种更为容易把握和换算的通用交换语言的需要。直到金属货币、特别是金银作为一般等价物和世界货币的出现，才有了联结世界市场的共同纽带，产生了世界市场的通用交换手段，造就了使劳动、生产社会化的生产关系，也为世界性的物质和精神交往创造了条件。历史上，文化的、宗教的、政治的因素对商品货币关系的制约也阻碍了人的交换和交往活动。我国历史上使用货币交换已久，但由于朝代更迭，国家分裂，战乱不已，很难建立货币的信用，也就难以全面取代实物交换。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分裂，朝代更迭频繁，每一朝代，公、私皆多有铸钱。铸币具有地方性，“致商货不通，贸易颇隔”^②；铸币又具有复杂性，币制紊乱，恶钱充斥。结果，多用布帛交换，货币交换衰退。^③而货币作为发达的生产要素，“是社会形式发展的条件和发展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主动轮”（马克思）。马克思认为，金银作为一般等价物、一般交换手段和世界货币，具有“世界主义”的性质，它在帮助世界市场形成、造成人们彼此间的世界主义的关系方面起着异常有力的作用。

自然经济中生产的直接目的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交换价值，需要的界限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016—1018页。

^② 《魏书·食货志》。

^③ 参见余也非：《中国古代经济史》，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273页。

就是生产的界限。即使有剩余产品，也是少数统治者疯狂消费、过度消费的对象，而不是用于投资和扩大再生产，因为货币还没有变成资本。这就使技术的改进和交流既无社会的条件，也无经济的刺激。当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明进入阶级社会后，那些富裕的统治阶级，国王、王公、贵族和僧侣根本不过问他们吃的用的是怎样生产出来的。他们最关心的是强迫农民和手工工匠，把全部剩余产品上交给主人，自己只能留下必要的维持生命的部分。这种只知道剥削技巧而不过问生产技术的习气，使这些统治者不懂生产方法中的明显缺陷，更不具备有效改进生产技术的知识。农民和手工工匠虽然了解应该怎样改进技术，但是他们根本没有积极性，因为增加生产对他们自己并无好处。结果这种生产关系迫使技术停滞实际上超过了一千年。^① 当经济发展到为交换价值而生产，特别是为剩余价值而生产，货币演变为资本时，才有了近代的产业革命、技术革命。

二 中国哲学史上的言意之辨^{*}

言与意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对重要范畴，言意之辨就是讨论语言和思想的关系。大体上说，言意之辨源于先秦，盛于魏晋，终于明清，为中国哲学史留下了丰富的思想材料。

(一) 言意之辨的发端

春秋战国时期，天与道、神与人、性与命这些“形而上”的问题，已成为哲学思考的对象。人们在表达这些感受和思考时，发现许多内心世界的感受不能用语言表现出来。孔子最早揭示了语言和思想的矛盾，认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外传·系辞上》）。在他看来，天道性命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因此“予欲无言”（《论语·阳货》）。

庄子继承了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知者不言，

^① 参见卡洛·M. 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3卷，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79页。

* 载《聊城师范学报》1998年第2期，英文版载 *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 Vol. 32, No. 3, New York: M. E. Sharpe, Inc., Spring 2001, pp. 18 - 31.